

■我的文学观

大海给予我想象

□韦廷信(壮族)



韦廷信，壮族，1990年出生于福建霞浦。中国作协会员。诗歌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。著有诗集《土方法》。入选《诗刊》第36届青春诗会，获第10届福建省百花文艺奖、第35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。

加缪在《重返提帕萨》中这样形容大山：“但随着靠近，它逐渐凝结，最终染上周围海水的色泽，宛如一道突然凝固的滔天巨浪，悬在骤然平静的海面上。”他以大海为喻，把大山比作一道凝固的滔天巨浪，暗含着奔涌的力量与未散的气势，给静止不动的大山带来了气魄和动感，有了鲜活的张力。而在更早的东方，李白在《横江词》中说：“浙江八月何如此，涛似连山喷雪来。”大海在此处是本体，给予诗人巨大的想象空间。不管是作为喻体还是本体的形式出现，大海始终能给人们带来艺术的想象。所举的两个文学比喻，一个以山喻海，一个以海喻山，这种穿越时空的呼应，揭示了大海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独特地位——它是一片永恒的想象之境。

这些年，我在一步步靠近这片想象之境，领略那未知。日复一日，“大海”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。我的作品会不自觉地充盈着海水的气息，布满海水的色泽。围绕着“大海”这一核心意象，我试图探讨由它引申出的诸如自由、生命、时间、孤独、探索、生态等主题。

我出生在东海边上的一座小县城——霞浦，东海再往东就是广阔的太平洋。我比较容易接近大海，容易接近想象力的漩涡中心。台风在离这不远的海面生成，想象力也跟着来了。

大海给予我想象，因为它未知、深邃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在我去过的诸多岛屿中，小西洋岛和北碓岛给予过我大量的灵感。小西洋岛最引人入胜的是它的连岛沙洲，像一条彩带系住大海的腰身，一边是外海，一边是内海。外海通向太平洋，风浪较大，海面更为开阔；内海朝向内陆，与三都澳等海湾水域相连，受岛屿和陆地庇护，风浪相对平缓。沙滩旁边还有一处看似人工雕琢的礁石，人们把它叫作望夫石。在海边生活的男子需要出海作业，与风浪斗争，有可能会一去不复返，思念的妻子一日日在海边苦等出海未归的丈夫，最后站成了一块望夫石。

我在小西洋岛的连岛沙洲上露营，沙洲的沙质细腻，沙粒雪白，踩在上面松软如雪。聆听涛声、仰望星空是这一夜必须做的事情。那晚很幸运，我看到了夜光藻集群而形成的“蓝眼泪”，那梦幻的蓝色光芒是漆黑的夜里最后的蓝。在月亮沉海之前，我爬到帐篷外坐着，静静地看着月亮在头顶慢慢向外的海面落下。在一篇小说里，我写下这样的文字：“这一晚我看着月亮高悬，到一点沉入海

里，我们相互深情凝望。我眼看着它沉入大海，却无能为力，它似乎早已知晓结局，并无丝毫慌乱。它落海的姿态和夕阳落山一点也不一样，夕阳落山是壮烈的，而月亮沉海却是无限凄美。当月亮完全落下去，会有一段特别漆黑的时刻。而只要熬过这个时刻，太阳就能成功接力。它们像是光明的接力者，让人欣慰。我不禁感慨，这个世界总有人在为我们日复一日地递送希望。当月亮彻底沉没，太阳升起，我的内疚之感也随之消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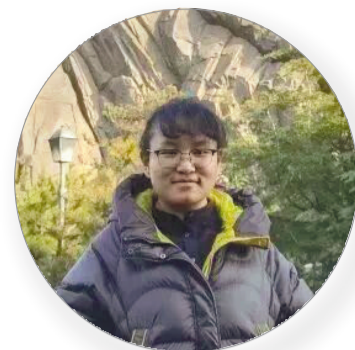
距离小西洋岛不远处的一座岛屿叫北碓岛，两者都隶属霞浦县海岛乡，相距不过15海里。我为岛上的羊群写过一首诗《北碓岛的羊》。其实，在去北碓岛之前，我就已经在酝酿这一首诗了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短视频，一只羊在北碓岛的礁石上看海，它显得孤独，而又似乎在思考。在北碓岛，我找到了那只羊，也可能是另一只羊，但这不重要。当我看到羊站在礁石上看海，就像在蓬莱岛遇到仙人一般兴奋并感到不可思议。我在看海的羊身后凝望一会儿后，心慢慢地静下来，仿佛那一小段时间，这片大海属于这只羊，天地只由这只羊主宰。我成为闯入羊之领域的外来者。

站在岸上看大海，和站在大海中央看大海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岸上是稳固的，我们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远眺大海，并不能切身感受它，只有当我们进入大海，感受海水流动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倾斜、无序和可怖，以及它的无穷美妙。

我在海边写诗，从浅海写到深海，从深海写到海底，保持一种连贯性与深度。但这些远远不够，如果把大海比作一个人，这些都只是他的表面，我的笔触还可以继续深入到他的精神内核，寻找精神的深度和边界。我常常会在诗里提问，更多的时候是在问自己：我们身为人类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在和其他物种共同面对同一件事物时，它们会不会有看法，它们的看法是怎样的？我很好奇它们的想法。我想文学的视角就藏在那里，小众的、特别的、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。

海岛的事物是澎湃的，也是宁静的。海水打着礁石的时候，你一开始会觉得心潮澎湃，甚至想要御风飞翔。而在海岛上住久了，听久了海浪击打礁石的声音，你的心开始变得宁静。你也会听得见浪花破碎后的宁静和琐碎，像生活的“一地鸡毛”。浪漫和现实都在，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心境和看问题的视角。

德典白姆，藏族，1996年生于西藏拉萨。小说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西藏文学》《西藏文艺》等。小说《沙门钵闍布》获第四届《西藏文艺》“双年奖”



□德典白姆(藏族)

书写我走过的山河与故土

我父母因文学相识，于是便有了我，周边的人因此常调侃我为“文学的结晶”。所以我选择文学，可能是命中注定。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何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。小学毕业后，我离开拉萨，来到了江苏常州，就读于当地一所中学的西藏班。那时我们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太多课余时间，阅读便成了理所当然的课外选择。我读得最多的是课外书，读端智嘉，感受其作品中喷薄而出的激情；读鲁迅，他让我觉得文学必然是一个民族的镜子，照美丑、显真实。我感激我当时阅读的作家们，是他们给了我一种稚嫩的自信，认为自己也要走上这条路，以笔为剑斩丑恶，甚至自觉舍我其谁。此时此刻，我还在走这条路，也算是一种坚持吧。

当然，那种片面的认知并不是我决定选择文学的唯一理由。我是一个善于与自我、与世界和解的人，定然不会仅凭一腔热血坚持下来。我永远感激史铁生的出现，他是照亮我文学之路的明灯，就像他在《奶奶的星星》里写的，每一个离世的人都会变成星星为地上的人照亮。而他也自始至终影响着我的创作。相较于端智嘉与鲁迅的作品，我在史铁生的作品中读到的是一种悲悯之情，温柔平和的文风下，那悲悯之情如雪山流下的潺潺雪水般，清澈平缓又细流不断。我在史铁生这里才知道，原来书写历史和时代也能如此平易近人，书写人民又能这般深刻易懂。他总以胡同里的人和事为出发点，探询社会、人类乃至宇宙的命题。

我本科、硕士都选择了文学专业，最后谋生的行当也是文学编辑。友人说，这是最好的安排，爱好与事业相同是人之幸事。我自己也该觉得庆幸，但实际上，我写作时，总有一丝焦虑伴随。我一直认为，自己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写作道路，具体来说就是缺乏真正的经验。我早期的写作多靠习得的知识想象而成，虽然因写作立意和叙述方式的尝试受到部分人的喜爱，实则悬于空中并不扎实。直到我有了深入生活的机会和经验后，我才发觉自己创作可依附的根基在哪里。

2023年的夏天，我前往拉萨市林周县采访，行经一个村落时，遥望远方，那里青山连绵，山顶是蓝天白云，山脚是村落民居，前面平铺着绿色的田地。此前，我也见过许多类似的景象，但就是在那一刻，我仿佛真正感受到“绿水青山”所指。站在林周的风里，我终于懂得，真正的写作，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想象，而是脚踩在大地上的倾听与凝望。那

些悬在空中的字句，再精巧也少了根须；那些凭知识推演的故事，再完整也缺了心跳。而眼前这片青山、蓝天、村落与田畴，恰恰把我从虚浮的写作里拽了出来。我不必再刻意模仿谁，也不必困在“该写什么”的迷茫里。我该写的，是我亲眼看见的山河，是我亲身走过的乡土，是我心底最真切的感动。蓝天白云映着青山，民居依偎着田野，安静、朴素、坦荡，这就是最动人的文本。

2024年5月，我前往昌都市八宿县开展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，其间与村民有了深层次的接触。我所在的村是一个扶贫搬迁村，他们的原村在深山中，搬迁到县城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，但故土难离的情结、地域气候的差异，再加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骤然转变，也让不少村民在生活转型期间遭遇诸多难处。其中，身处时代变革之中的农村家庭妇女，内心的割裂感与生活的矛盾感尤为突出。受此感触，我结合驻村期间的真实经验与感受，创作了一篇聚焦乡村振兴、扶贫搬迁，刻画基层农村女性内心世界的小说。

自此，我更加频繁地在雪域大地上行走。西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当地素来秉持万物有灵的理念，许多玄幻的故事与神话在民众生活中十分常见，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神话与民间故事，承载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探寻，以及对世间万物的认识与解释。一方水土孕育的独特文化与民俗风情，皆是滋养创作的丰厚养分。我尝试着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我的小说创作中，不为制造噱头，只为书写此地人民的真实生活。

除了民间传说，流传于雪域大地的民歌，也时常为我迸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在日喀则市萨迦县，我听到一首酒歌中有这么一段歌词：“汉地启明之星，赐我藏地福泽。”歌词里提及的“启明之星”，坊间普遍认为指宋恭帝赵显，他投降元朝后受封为瀛国公，被送往吐蕃修佛，佛法修为造诣极高。我在萨迦亲眼见到了相传赵显曾经修行过的山洞。眼见实景，耳闻歌谣，种种见闻交织相融，我便以叙事落笔，创作了小说《亡于流言的国君》，完整记录赵显跌宕起伏的一生。

长久浸身文学创作，我也渐渐明晰了文学于我真正的意义。在我看来，文学是跳出自身局限，以旁观者的视角静心审视世间万象的独特方式。文学更像是一名青年，懂得柴米油盐的生活，也有一往无前的魄力，善良而勇敢，自由而热烈。

■编辑手记

聚拢散落在大地褶皱里的文学声音

□王越

每当黄昏降临，我习惯站在21楼编辑部的窗前眺望，远处成吉思汗陵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。作为《鄂尔多斯》文学月刊的一名编辑，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刻想起老主编乌雅泰先生说过的话：“一本地方文学刊物，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族谱。”

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鄂尔多斯，蒙古语意为“众多宫殿”，地处河套平原腹地，黄河“几”字弯的怀抱之中。这里既有成吉思汗陵寝的庄严，又有库布齐沙漠的苍茫；既有现代能源城市的蓬勃，又有草原游牧文化的悠长。在这样的地域办一本文学刊物，我们面对的首要命题便是：如何让文学成为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？

《鄂尔多斯》的办刊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，曾长期分设蒙古文、汉文两个编辑部，各自拥有独立的编辑队伍和作者群。这种模式保障了民族语言的传承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资源的割裂。近年来，我们尝试打破这种壁垒，通过翻译、对话、联合采访等方式，让两个语言世界的文学实现互通。2023年，刊物进行了重大改版，提高稿酬标准，扩大组稿范围至全国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继续通过“鄂尔多斯作家”专栏，持续推介本土作者；开设了“北疆文

化”特辑，挖掘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；还与《民族文学》合作，承办了“亮丽内蒙古”翻译作品专栏的读刊会，推动两类作品之间的双向译介。改版的效果是显著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文学界重新确立了“鄂尔多斯”这个文学地理标识。

2023年3月，我到《鄂尔多斯》编辑部工作。那时的刊物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，主编指着墙上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说：“我们的工作，就是在这个黄河的‘几’字弯里，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。”我逐渐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。“打捞”意味着主动寻找，意味着深入那些文学雷达通常覆盖不到的区域——牧区的蒙古包、农区的土坯房、矿区的临时工棚、城市的移民社区。我们的作者名单上，有牧民、教师、退休干部、打工青年等，他们的职业身份各异，但都在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我尤其珍视与那些非专业作者的交往。一位叫巴图的老人，每年冬天都会从鄂托克前旗寄来手稿，字迹颤抖但情感充沛，写的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草原上的往事。我从没有见过他，但通过稿件往来，我得知了他的妻子已故，儿子在城里工作，他一个人守着老宅和一群羊。他的写作是一种抵抗孤独的方式，也是与过往对话

的仪式。我认真编发他的每一篇散文，尽管它们或许不够精致，但在这个老人虔诚的文字中，我看到了文学最本真的功能：对抗遗忘，确认存在。

在与民族作家的交往中，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。我认为，好的民族题材写作，应当具备三个维度：文化根性、人性深度和现代意识。

文化根性不是民俗符号的堆砌，而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内在逻辑的理解。蒙古族作家乌力吉布林（笔名布林）的长篇小说《动荡的鄂尔多斯》《消失的世界》写出了鄂尔多斯各族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震荡。他笔下的人物，不是博物馆里的民族标本，而是有血有肉、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现代人。

人性深度要求作家超越民族身份的界限，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。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《醉马草》写一个牧区女孩与一只老羊的故事，表面看是草原风物志，内核却是关于生命尊严与代际传承的普遍命题。这种写作，能让各地读者毫无障碍地进入蒙古族的生活世界，又在其中发现意想不到的情感共鸣。听编辑部的前辈讲，2016年冬天，娜仁高娃第一次走进《鄂尔多斯》编辑部。她穿着朴素的蒙古袍，手里攥着一沓手稿，稿纸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。她说：“我想写沙漠里的故事，写那些骆驼、羊群，写沙漠里

的人怎么活着。”于是，在她的作品中，读者们可以看到沙漠腹地的牧人生活，看到那些“驮着魂灵的马”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寻找归宿。

现代意识意味着不回避矛盾、不远离现实。鄂尔多斯是资源富集地区，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。草原生态、移民搬迁、传统技艺的失传、青年一代的身份焦虑——这些现实议题，在我们的作家笔下得到了真切的呈现。

作为地方文学刊物的编辑，我也常常面临一种身份的尴尬。我们既要面对全国文学界的评价尺度，又要回应本地读者的文化需求；既要坚守文学标准，又要考虑刊物的生存发展。这种多重身份的拉扯，有时让我们感到疲惫，但更多时候，它赋予了我们独特的工作价值。

记得2024年初，我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。写信的是一位退休的蒙古族中学教师，他用蒙古文写了一封长信，又请人用汉文翻译了一份副本寄来。信中说，他订阅蒙古文杂志《阿拉腾甘德》30年了，最近也开始读汉文版的《鄂尔多斯》，“因为想知道，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，是怎么看我的家乡的”。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。文学刊物的功能，或许正在于此：它不仅是作品发表的平台，更是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看见的窗口。

在鄂尔多斯，这种“看见”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传统与现代、游牧与农耕，在这里交织、碰撞、融合。我们的文学刊物，就是要记录这种交织过程中的心灵轨迹，就是要为这种融合提供精神的黏合剂。

《鄂尔多斯》依然是一份“小”刊物——发行量有限，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。但在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版图里，正是无数这样的“小”刊物，构成了支撑文学生态的毛细血管。它们保存着地方性的知识，维护着文学与土地、与人民、与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。

我知道，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挑战。新媒体的冲击、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、文学评价体系的重塑—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但每当我收到一封来自牧区的来信，或者在一次文学活动中听到读者说“你们的杂志让我开始写作”时，我就重新获得了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这时，我想起娜仁高娃在一篇创作谈中写的话：“写作是为了让那些在风中消散的事物，在纸上重新聚拢。”作为编辑，我的工作或许也是如此——让那些散落在大地褶皱里的声音，在刊物中重新聚拢，成为可以被阅读、被记忆、被传承的文学。

(作者系《鄂尔多斯》编辑)

